

印度史

A HISTORY OF INDIA



(最新修订版)

INDIAN OCEAN

[德] 赫尔曼·库尔克 迪特玛尔·罗特蒙特 著
王立新 周红江 译

中国图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印度史 / [德] 库尔克, 罗特蒙特著; 王立新, 周红江译.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006-8233-2

I. 印… II. ①库…②罗…③王…④周… III. 印度-历史 IV. K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6386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01-2006-1248

A HISTORY OF INDIA

Copyright © 1986, 1990, 1998, 2004 Hermann Kulke and Dietmar Rothermun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China Youth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策 划: 王钦仁 杜海燕

责任编辑: 杜海燕

装帧设计: 卡 门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发行电话: 010-84039659

编辑电话: 010-84046485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33.75

插 页: 4

字 数: 48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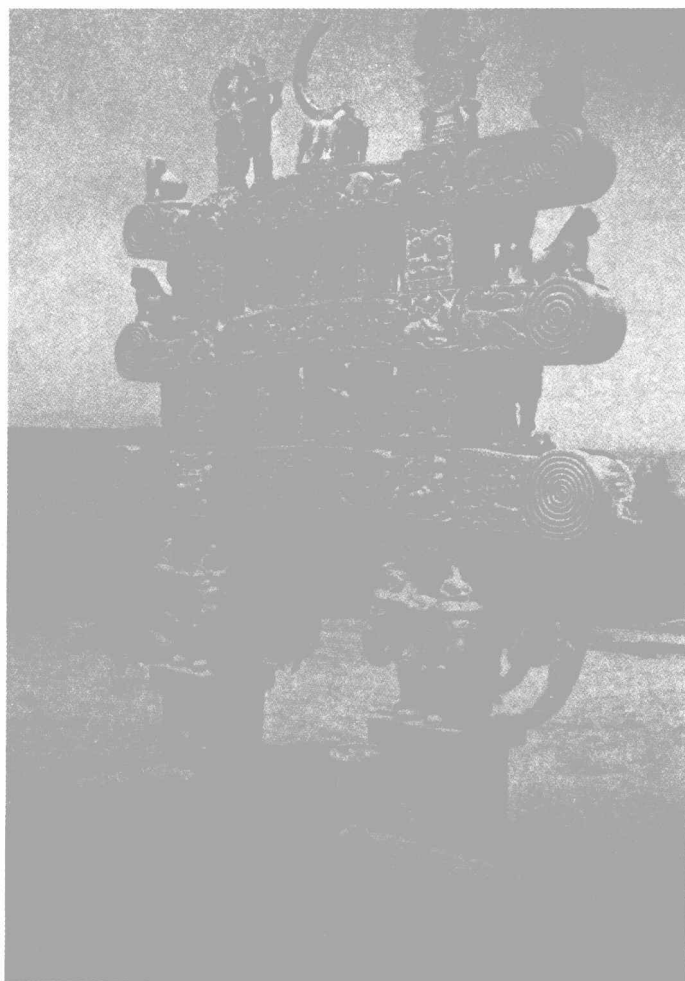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58.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4047104



出版说明

印度,具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面积居世界第7位,人口占全人类1/6,多民族,多宗教,自然地理条件复杂,文化各异;西方工业革命后,逐步沦为英国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巴基斯坦分治后实现独立。

搜索印度的关键词,我们诧异地发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与我们中国何其相似的国度。而且,这个国家与我国比邻而居,唐代高僧玄奘曾西去那里取过经,建国后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它第一个同我国建交,也曾在20世纪60年代与我国发生过大规模的边境冲突。

或许正是出于这样微妙而复杂的渊源,自东晋、唐代起,直至近现代,关于印度史的著作就一直在我国不断涌现。但是出于种种条件限制或时代因素,能够系统而完整地提供印度历史全貌的著作,迄今为止却是少之又少。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社特引进出版了德国学者赫尔曼·库尔克和迪特玛尔·罗特蒙特合著的《印度史》一书,以飨读者。

本书自1982年初版以来,已先后出版了两个德文版本和四个英文版本,出版发行的范围也早已超出了它的诞生地——德国,风行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并被英国高校指定为印度史的专用教材,多次印刷。

本书此前没有中文本,现由北京大学印度史专业博士王立新和周红江根据该书英文版的最新修订第四版全文译为中文。该书出版时,对于原书中的地图我们进行了删略;而原书中关于中国的论述,如边

界冲突等,为保持此书的原貌,完整表现原作者本人的陈述和视角,我们则予以了保留,其论述并不代表我社观点。

希望通过本书,读者能够从更全面、更系统的角度来了解印度的过去与现在,但在阅读的同时,也能对原作者表达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和认识。

中国青年出版社

译者序

现在,由译者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共同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是一部由两位德国学者“为学生和普通读者准备的”印度史著作。截至目前为止,这部印度史著作已经先后出版了两个德文版本(1982年、1998年)和四个英文版本(1986年、1990年、1998年、2004年),而它出版发行的范围也早已超出了它最初诞生的国家——德国,在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英语国家也广泛流行起来。现在呈献给我国读者的中文译本则是根据该书的最新英文版翻译而成的。这个新版本涵盖了印度从史前时代直到2003年的全部历史过程。无疑,与在较早时期翻译成中文的其他几部海外印度史著作(主要是印度本国学者的著作)相比,这个印度通史译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完整、可能也是最系统的印度史全貌。

诚然,我们中国读者并不缺少印度史方面的著作,甚至也不缺少印度通史方面的著作。远在近代以前,东晋高僧法显的《佛国记》和唐代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就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印度各个方面的宝贵知识,以至直到现在这两部著作还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印度史的珍贵的一手文献。自近代以来,大概是由于类似的历史遭遇和共同的现实关怀,我国出版的印度史著作更是层出不穷。据译者所知,早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上海广学会就翻译出版了英国人宝星亨德伟良撰写的三卷本《印度史揽要》(*Brief History of the Indian Peoples*)一书。两年后(1903年),东京闽学会又出版发行了程树德编译的《印度

史》。进入民国时代以后,我国虽继续饱受内忧外患之苦,但关于印度史方面的编纂工作并没有因此停顿下来。民国十五年(1926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了刘炳荣编著的《印度史纲》,次年就又出版了该书的第二版,书名更为《印度史》,内容也较前一版丰富了许多。这部著作可能是近代以来我国学者独立编撰的第一部印度史著作。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上海正中书局出版发行了中国人编著的另一部印度史著作,即李志纯以牛津印度史教本为蓝本、参照剑桥印度史及其他英印学者著作写成的《印度史纲要》一书(1972年,台北正中书局出版了该书的增订版,附有印度专门名词中英对照表及注释)。

新中国成立后,对印度史的编撰兴趣进一步增长。特别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取得支配地位,用新的观点和方法重新编纂印度史就成了新时代的新需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武汉的湖北人民出版社在1957年出版了季羨林编著的《印度简史》。这是一本按照正統的苏式历史编纂体例编写而成的印度简史著作,是一本企图“真正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成的书”,它把印度历史区分为“原始公社时代”、“奴隶制度时代”、“封建制时代”、“近代印度”和“现代印度”等几个阶段,分别叙述了印度在各个时代的状况。同年,北京三联书店翻译出版了印度学者潘尼迦(K.M. Panikar)撰写的《印度简史》(*A Survey of Indian History*)和苏联学者奥西波夫撰写的《10世纪前印度史》。就前者而言,它和此后翻译出版的印度学者的著作有着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都努力把印度历史描写成一个所谓的自古就有的“印度民族”的历史。例如,商务印书馆1964年翻译出版的《印度通史》[辛哈和班纳吉著]以及1986年翻译出版的《高级印度史》[R.C. 马宗达、H.C. 赖乔杜里和卡利金卡尔·达塔著],都强调了印度自古以来就具有的“基本统一”或“基本一致性”。至于奥西波夫撰写的《10世纪前印度史》,则是按照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强调了印度各历史阶段的“各种经济结构的交替”。这样,与先前印度史编纂中过分注重宗教和政治的倾向相比,奥西波夫的这本著作(尽管它不是通史著作)确实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显得独具特色。这个时期另一部独具特色的印度史著作是1958年中华书局翻译出版的《印度史话》(罗浮洛·桑克利迪耶那著,英译本书

名为“*From Volga To Ganga*”),它不是一部普通意义上的印度史专著,而是“用19个故事的形式,把印度从原始社会起到现代为止的全部历史,生动地刻画出一个轮廓”。当然,和同一时期出版的其他一些印度史著作一样,它也在内容和立场上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此后,随着中印关系的日趋冷淡,我国对印度史著作的译介和编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近停顿。在这个时期出版的唯一一部印度通史著作,就是前面提及的由张若达、冯金辛和王伟等人翻译的《印度通史》[辛哈和班纳吉著](197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书的修订版)。^①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印度史的译介和编纂工作才又慢慢恢复起来。无疑,我国的这个“新时代”是一个文化反思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出版的印度史著作明显带有这个时代的文化痕迹。除了前面提及的《高级印度史》一书外,我国学者也先后编纂了几部印度通史著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可能就是1990年哈尔滨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出版发行的《印度通史》(培伦主编)了。这本书的“引论”部分集中反映了它的反思性,对以往有关观点的“反思”构成了这个“引论”的突出特点。然而,吊诡的是,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反思,整部书的编纂体系却被置入了一个极其正统的参照框架当中。这本书分为古代印度、中世纪印度、殖民地印度和独立后的印度四编,而这四编事实上又被分别与印度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时代、封建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时代以及某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时代对应起来。2004年,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承节独著的《印度史》一书。与培伦主编的《印度通史》相比,该书对传统编纂体系的反思和修正要彻底和完全得多。在该书的“绪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文字:

……历史研究者的任务是要复原和分析历史过程,而复原要具体化,个性化,要有血有肉,丰满结实。公式化、教条化

① 有趣的是,该部《印度通史》的第一个中文版本(1964年)是“为高等学校历史系做参考教材之用”,它的修订版(1973年)却是“供内部参考”用的。无疑,同一部海外历史著作在中国的历史境遇的变迁折射出的是我国时代精神的变迁。

的写法已被学者们抛弃。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从远古到当代的印度史。笔者期望能把印度特有的浓厚色彩勾画出来,以期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强烈印象:印度史就是印度史,和其他国家的历史比有相同点,但又确实非常非常地不同。

通过对“公式化、教条化的写法”的彻底摒弃,这部由我国学者最新编撰出版的印度通史著作诚然完全消解了那种传统的、也是正统的编纂体系。不过,遗憾的是,这一点却是通过消解一切编纂体系来实现的。在这部由我国学者最新编撰出版的《印度史》专著中,我们看不到任何一种编纂体系的存在。这样,这种修正同时也只是代表了方法论上的虚无主义。^①

然而,现代的历史编纂和历史研究一样,总是需要某种体系或参照框架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现在读者们看到的这部由两位德国学者编撰的《印度史》显示出了自己的特色。对我国读者来说,它是一部由当代著名西方学者撰写的印度通史著作,因此,它体现的是当代西方学术界的学术传统、学术取向、学术关怀和学术观点。^②与印度学者倾向于把印度历史描述为“印度民族”的民族史和我国学者倾向于把印度历史描述为一种社会发展史不同,当前的这部印度史专著则力图把印度史描述为一种文化或文明的历史。在“前言”中,两位德国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印度的历史就是一个伟大文明的迷人史诗。它是一种具有惊人的文化延续性的历史。”然而,同样有些吊诡的是,纵览全书后,我们或许会发现作为该书历史编纂的参照框架的似乎并不是某

① 当然,我国在这一时期出版的印度史著作远不止上述两本。例如,1981年,台北的三民书局出版(在大陆发行)了吴俊才编著的《印度史》;1991年,长沙的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由华东师范大学组织编写的《简明印度史》,等等。

② 2005年,台湾的左岸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翻译出版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系教授芭拉·麦卡夫和汤玛斯·麦卡夫编写的《剑桥印度简史》。这也是一部由当代西方学者编撰的印度史著作,但它不是一部印度通史著作。它叙述的是从莫卧儿时期至今的印度历史。

种印度文化或文明的发展,而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结构”的发展。实际上,该书正是以此为参照基点把整个印度历史区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三个时期的,这三个时期被分别对应于印度政治发展的三个阶段:古代帝国时代、地区王国时代和现代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成的时代。诚然,该书作者的这种看上去十分矛盾的处理方式是与西方特别是德国的学术传统密切相关的。至少在德国,自黑格尔以来,对政治权力(国家)和政治发展(国家形成)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强调一直是学术史上的一种传统取向。在马克斯·韦伯那里,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种反动,这样一种学术取向(在他对印度历史的研究和说明中)也是十分明显的。现在,赫尔曼·库尔克和迪特玛尔·罗特蒙特撰写的这部印度通史著作大概只不过是再次折射了这种德国式的学术传统和学术取向。

然而,再次显得有些吊诡的是,当这两位德国学者企图把印度历史纳入他们作为西方特别是德国人所具有的历史的政治发展图式中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又游离于这个发展图式之外。在西方人的政治理念中,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发展或国家形成中的一个基本面向,就是作为一种道德共同体的政治体而非一种纯粹的利益和力量均衡体系的发展。即便在强调政治发展或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暴力因素的西方学者中间,国内政治发展或国家形成的这一面向也是无法完全视而不见的(例如,在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那里,它就分别是以“意识形态”和“合法性”的形式出现的)。作为一种纯粹的利益和力量均衡的政治体系的发展是典型地表现在国际政治领域,而不是国内政治领域。然而,库尔克和罗特蒙特在他们的《印度史》中为我们勾勒出来的印度政治发展的图景却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利益和力量均衡的政治体系的发展过程。这一点在印度的古典政治理论著作中有着典型的表现。很明显地,考提利亚的《政事论》向我们展示的那种政治体系和政治理论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体系和理论(参看该书第二章“《政事论》

中的政治体系”一节)。^①毋庸置疑的是,这样一种国际政治体系和理论的发展既是西方人心目中的那种国内政治发展或国家形成过程的反面,也排斥着后者的发展。这样看来,上述两位德国学者在《印度史》一书中实际达成的和他们原本想要达成的不仅不是同一的,反而是直接对立的:他们为我们描述出来的政治发展图景与其说是印度的政治发展,还不如说是印度的政治不发展!显然,这两位德国学者并没有明白地意识到他们的编纂体系中存在的这双重吊诡,因而也就没有努力去加以克服。当然,这是任何一种企图用与本国或本文化的历史相适应的参照框架去“裁剪”别的国家或文化的历史的编纂努力经常会碰到的难题。

不过,在译者看来,这双重吊诡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两位德国学者对印度历史编纂的失败。恰恰相反,当他们事实上把印度历史纳入到某种国际政治的视野下的时候,他们对印度历史的描述不仅没有显得不真实,反而具有了一种相当可贵的品格。大概正是由于他们把印度历史纳入到了国际政治的视野下来观照,他们对印度历史的描述才具有了一种独特的风格:作为他们的历史描述的一个主轴的,既不是社会发展史中的经济社会结构,也不是民族主义史学中的民族的统一性,而是人类的有组织的暴力活动——战争。在“导言”中,两位德国学者对印度历史上堪称“撒手锏”的战争武器、战争方法及其一般政治影响有着专门的论述。他们对军事技术、军队组织和作战方式的进步在印度各个历史时期所产生的重大政治影响和后果有着深刻的洞见和精彩的描述。在中世纪晚期,印度土著印度教政权为什么不能抵御中亚突厥人穆斯林军队的进攻?大莫卧儿帝国的首位皇帝——巴伯尔何以能够凭借一支相对不大的武装力量征服印度?他在军事征服上成功的秘密何在?莫卧儿帝国究竟是一个传统的“骑兵国家”,还是一个近

① 虽然韩非子在他的政治论说中表达出来的政治理论也具有同样的现实主义风格,也同样洋溢着对权力或实力的崇拜,但它和考提利亚的政治理论的基本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前者阐述的是一个君主如何管理他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的“治国”理论,后者则是一种典型的国际政治理论。

代的“火药帝国”?为什么在军事技术上并不十分占优势且相对廉价的欧洲式步兵队能够击败曾长期在印度不可一世的土著骑兵,从而成为欧洲人征服印度的得力工具?莫卧儿人的陆权和欧洲殖民者的海权是如何在印度此消彼长的?为什么葡萄牙人虽曾在16世纪控制了印度洋和印度洋上的贸易,却始终未能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全球性的海洋帝国?为什么最终是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征服和占有了印度?为什么独立后的印度曾长期坚持无核化而最终又自食其言地“跨过核门槛”?对传统安全的关注究竟在印度现代的外交政策中占有多大的分量?曾遭它的强大邻居肢解从而变得更加弱小的巴基斯坦何以在近年来实现了与印度“平起平坐”的夙愿?在这些饶有趣味的问题上,《印度史》的作者们不乏独到的阐释或提示,从中我们可以了解西方学术界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

当然,对这些观点以及该书作者们在其他问题上表达出来的西方学者的观点,我们不应该也没有必要照单全收。在学术研究中,学者们的“客观的”学术观点总是难免受到他们的主观的价值取向的影响。换言之,学者们的学术观点总是或多或少地反映着他们的意识形态。两位德国作者在这部印度通史著作中表达出来的一些观点就明显带有西方主流政治取向的痕迹。在该书的现代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论及有关巴基斯坦和中国的问题时,明显有将两者“妖魔化”(用一句流行语)的倾向,而对印度则处处表现出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如果我们事先不知道该书作者的国籍,我们一定会推定该书的作者是印度学者,因为他们的观点是充分印度化的。自然,这不可能是由于这两位德国学者对印度抱有什么公民式的政治忠诚,而只能是因为他们持有的在当前西方学术界流行的民主政治偏好:在他们看来,只有西方式的民主国家才是优良国家,存在着“专制政权”的国家则是所谓的“邪恶国家”。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下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国家的行为和动机注定是优良的,而巴基斯坦和中国这两个“专制政权”的行为和动机则该受到普遍的怀疑和谴责。在这里,主观的政治偏向取代了客观的学术研究,德国学者传统的批判精神和深刻洞见都消失不见了。由此,在该书中最能体现也最需要学者的深刻洞见的

当代部分,却令人遗憾地充塞着一些毫无洞见的陈词滥调。例如,作者对“在印度这样的民主国家里,改革注定是缓慢的,但是已经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是牢固地建立在民主共识的基础上的,因而比起专制政权所取得的短暂成功来说更为稳固”的观点的认可(至少是部分认可),对“印度现在看来已成为美国的天然盟友”的盲目乐观,都很难说是基于客观严谨的学术研究,还是基于民主政治偏向。

当然,我们在批评别人的时候,也需要避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应尽量避免让我们的意识形态和主观好恶影响我们自己做出合理的判断。实际上,对读者来说,一部学术著作真正重要的并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哪些观点可资借鉴和吸收,还在于它提供了什么样的观点可资分析和批判。眼前这部印度通史的学术价值并不在于它对印度历史中的各个问题都提供了无可争议的解答,而在于它提供了有代表性的西方学者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在于它从西方学者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印度历史的一幅新的图景。根据上面所说,这幅新的图景就是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部军事政治史的印度历史,从而也是各种政治势力(征服者)在印度兴衰成败的历史。它向我们昭示出来的一个基本史实是:在“大国的兴衰”或“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除了经济变迁的影响,作为硬实力的军事实力的消长和对比也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在中国和东亚迅速崛起的新时代背景下,这部《印度史》似乎印证了我国古代伟大的战略家孙武的一句名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最后,需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尽管这部印度通史表达的观点并非都不容置疑,但整个说来,这部印度通史为我们树立了现代历史编纂学的一个典范。它并不满足于对印度各个时期的历史做简单的叠加,而是进一步把对印度各个时期历史的编纂转变成对印度全部历史的系统研究。帕森斯曾经说过:“一篇专著同时又是一篇理论论文,才

是经验研究的最高级形式。”^①库尔克和罗特蒙特的这部印度通史专著看来是沿着这个方向所做的一个不错的尝试。在这部印度通史著作中,印度各个时期的历史不是被简单地“凑合”在一起,而是被纳入了一个统一的参照框架中,从而使对各个时期印度历史的陈述同时构成了对全书总命题和观点的论证:历史编纂变成了历史研究。

本书主要部分译介工作分配如下:前言、导言和正文的第一至第四章等部分由王立新翻译和审校,正文的第五至第八章以及“展望”等部分由周红江初译,王立新二译和审校。受译者水平和时间所限,译文中难免有错译和误译之处,还望学界大方之家雅正。

是为序。

王立新

2007年4月1日

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① T.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458页。

前言

印度的历史就是一个伟大文明的迷人史诗。它是一种具有惊人的文化延续性的历史。今天,它是 1/6 人类的历史。无论是印度历史学家,还是外国历史学家,都一直为这个重大的主题所吸引,而每一代也都撰写出了属于自己那一代的印度历史。最近已有几部印度史著作出版,当前的作者们因而可能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还要斗胆撰写另一部印度史呢?

首先,我们两位作者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的印度史研究进展迅速,因而需要更加经常地综述新的研究成果,以便反映当前的知识状况和为进一步的研究抛砖引玉。这种最新的综述正是作者们希望该书提供的东西。不仅如此,从古至今的印度历史是一个如此庞大的主题,以至于必须有两个以上的作者才能应付得了。因此,对印度历史的许多考察都是由许多作者集体完成的。不过,这些作者们却很少能够享有在同一机构中共同工作和在许多年中比较各自对印度史的研究成果所带来的好处。这是当前作者们的幸运,他们已经在海德堡大学南亚研究所共同工作了将近二十年。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他们首次应一家德国出版商的邀请开始了这项共同的事业。德文版是于 1982 年出版的,修订版则是在 1998 年面世的。首个英文版本是在 1986 年由位于伦敦的克卢姆—海尔姆公司旗下的大卫—克卢姆(David Croom of Croom Helm, London)公司出版的。后来,伦敦的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 London)获得了这

本书的版权。自此以后,劳特利奇的编辑们有力地推动了这本书的新版本的面世,而这些新版本似乎已经吸引了许多读者。由于受到他们工作热情的感染,这两位作者在2003年12月提交了这本书的全新的英文第四版。他们更新了与当代史相关的部分,还考虑到了该领域中的新近出版物,以使其能够反映出历史研究的现状。

该书的作者们从与印度、英国和美国同行——其中许多人不能阅读他们的德文版本——的讨论中获益匪浅。他们很乐意通过这本书与他们交流。然而,这本教材并不只是一个历史学家之间的对话,它是为学生和普通读者准备的。该书的作者们打算在这里向这些读者做一个自我介绍。赫尔曼·库尔克(Hermann Kulke)在弗赖堡大学研究印度学(梵语)和历史。他的博士论文是对那部描述了南印度神庙城市奇达姆巴拉姆(Chidambaram)的传统的文本——《奇达姆巴拉姆礼赞》(*Chidambaram Mahatmya*)的研究。他的第二部主要著作是关于奥里萨的噶加帕提(Gajapati)国王的。他曾积极地参加了德国研究理事会的首个奥里萨研究项目,是《札格纳特崇拜和奥里萨地区传统》(*The Cult of Jagannath and the Regional Tradition of Orissa*)一书的主编。之后他继续从事奥里萨方面的研究,并成为现在仍在进行中的第二个奥里萨研究项目的协调人。他还研究了印度的历史编纂学、中世纪时期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形成以及吴哥的神王崇拜。他出版了一部关于印度和东南亚国王和宗教崇拜的著作,编辑了一卷名为《印度的国家,1000—1700》(*The State in India, 1000—1700*)的论文集,最近还撰写了另一部德文版的《印度史》(*History of India*)。1988年,赫尔曼·库尔克担任了基尔大学新的亚洲史讲座教授。海德堡和基尔之间的距离并没有减少他与其合著者之间的联系。

迪特玛尔·罗特蒙特(Dietmar Rothermund)在马尔堡和慕尼黑大学以及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历史和哲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他完成了关于18世纪宾夕法尼亚历史的博士论文。然后,他去了印度,研究自由运动的历史,研究成果于1965年以德文出版。接下来他写了一本关于印度与苏联的书和一本关于英国统治下印度农业关系的十分重要的研究专著。他还用德文为圣雄甘地写了一部综合性的政